



当代中国 社会科学名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编写组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9

· 2 ·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

刘启林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1202 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7.5印张 455千字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80050-103-5/C·19 定 价：6.80元

前 言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大批从事学术工作的知识分子都在探索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有的研究外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的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认真的思考和观察，目的都是想使国家尽快地富强起来。这些具有深厚学术功底的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著书立说、开办教育、从事新闻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他们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影响了一代有文化的热血青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本书所要介绍的就是这些毕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著名学者。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有着什么样的个人经历，但他们都共同生活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中。腐败不堪的政治、长期停滞的经济、极不发达的教育，使近代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先进的国家。内忧必然引来外患，自己国家落后了，就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宰割。虽然许多人对此表现了麻木不仁的态度，但对这些熟悉中外历史和现实的知识分子来说，却强烈地刺伤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决心献身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大都是把这项工作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在经过多方面的探索 and 追求以后，直接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斗争之中，成了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传播先进思想的战士。另一些长期坐在书斋中的学者则以同样的爱国热情，对新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本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都先后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每一门科学又逐渐分

化出众多的分支学科，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边缘学科和交插学科。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分析的、综合的、定性的、定量的等等新的方法不断涌现。中国近代社会科学正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潮流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们这里介绍的这批学者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史哲经等各个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国近代各种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者或著名代表人物。也有许多人在中国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入各门科学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这些学科出现了崭新的情况。追踪这些学术探索者的足迹，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这些学者的学术造诣和他们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有不小的差别，我们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做出全面的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新中国社会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是被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的，也是人们永远不应遗忘的。当然，我们在肯定他们学术成就的时候，绝不是说他们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是无法超越的，更不是说他们每个学术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应该看到的是，随着近年来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不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与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新一代的学者在全新的条件下，以老一代学者不可能利用的研究手段，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们在不少领域中的成就，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前辈。然而，不管当代学者在学术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我们都可以从老一辈学术探索者身上，学习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学习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强烈责任感，学习他们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本书所要介绍的学者，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或它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过。他们都以在学术上不断探索的精神，走完了自己令人怀念的一生。本书把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分别做一简略的介绍，一方面是以学生和晚辈的心情，缅怀这些学术上的

— 先驱者。另一方面也希望广大读者循着这些探索者的足迹，了解社会科学，了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以使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健康的发展。

刘启林

1989年2月

目 录

前 言	刘启林 (1)
陈 垣	陈智超 (1)
徐旭生	黄石林 (15)
郭沫若	刘茂林 (27)
潘梓年	周云之 (53)
黄文弼	孟凡人 (74)
顾颉刚	刘起钊 (84)
范文澜	朱瑞熙 徐曰彪 (97)
郭宝钧	邹 衡 徐自强 (115)
陆志韦	杨耐思 (129)
金岳霖	倪鼎夫 (143)
董秋斯	凌 山 (156)
朱谦之	戴康生 (173)
向 达	肖良琮 (183)
张闻天	吴友文 (205)
汪奠基	刘培育 (226)
沈从文	王保生 (239)
侯外庐	黄宣民 (251)
聂崇岐	闻黎明 (262)
刘思慕	钟 立 (279)
梁思永	安志敏 (293)
姜君辰	苏学生 冯 雷 (304)
冯家昇	任一飞 (318)

尹 达	翟清福 (327)
许涤新	吴承明 (342)
翁独健	刘荣峻 (356)
钱俊瑞	林水源 (371)
韩幽桐	吴建璠 王家福 黄明川 (381)
吴世昌	施议对 (399)
孙冶方	冒天启 (410)
夏 鼐	王仲殊 (430)
徐懋庸	王 韦 (445)
陈梦家	周永珍 (460)
王崇武	张德信 (473)
何其芳	卓 如 (490)
石西民	杨润时 (505)
荣孟源	庄建平 (517)
顾 准	陈敏之 (535)
编后话	(548)

陈 垣

陈智超

陈垣，字援庵，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

1880年11月12日他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

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橘子是当地盛产的水果。干橘皮就是中药的陈皮。陈垣的祖父海学早年经营陈皮生意，19世纪50年代，在广州开设陈信义中药行。父亲维启继承祖父的事业。陈垣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药材商人家庭中。长辈中只有四伯一人读过一点书，陈垣是陈氏家族中第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1885年，五岁的陈垣随父亲到广州，在附近的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大约到十三岁时，已读完了四书五经。但是对于佶屈聱牙的《尚书》等，他无法理解，因此也毫无兴趣，只是硬着头皮死记硬背而已。

十二岁时，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看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书中列举了许多书目，简要注明作者、卷数、版本，特别重要的书，并加简单按语。这是一本为初学者指示读书门径的书，对于陈垣来说，无异是指路明灯。第二年，他又进而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眼界更加开阔。这两部书，可以说是他从事学术的启蒙老师。

当时陈垣的家境比较富裕。父亲虽然是商人，但对儿子购书读书总是毫不吝惜，他得以按着《书目答问》、《四库提要》挑选自己需要的书买来看，其中包括一套二十四史。在当时，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来说，是很难得的事。

1894年，广州发生流行病，学馆解散。他利用这个机会，认真阅读自己喜欢读的书。他晚年回忆说，这几年的自学，打下了一生做学问的基础。主要的经验是：从目录学入手，了解各书的大概情形，然后从中挑选出需要专门读通的一些书，深入细致地学习，务求甚解。也就是在博的基础上专。

1897年，十七岁的陈垣自广州北上，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原以为自己饱读诗书，必中无疑，结果却名落孙山，刺激很深。离开北京时，一位同乡老翰林为他送行，告诉他失败的原因在于作文不合八股程式，如果不改，一辈子也考不上。

他回到广州，觉得辜负了家庭的培养，不愿再接受父亲的接济，到蒙馆教书，自谋生路，从此开始了他七十多年的教师生涯。同时，他又将前此十科乡试、会试的考卷买来，先粗选出几百篇，再复选出一半，最后精选出一百篇，作为范文，反覆揣摩，隔日试作。等他把八股文学好，科举也废除了，两年的时间算是白费了。但也摸索出一些读书的方法，逐渐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

陈垣很早就表现出对历史的酷爱。他曾有“百年史学推瓠北，万首诗篇爱剑南”的对联，表达对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和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崇敬。赵翼可以说是他步入史学之门的第一位老师。现在还保存着一部他青少年时购买的《廿二史札记》，上面有他在不同时期写的各种批语。他认为赵翼这部名著可分“史法”和“史事”两方面的内容。他将全书拆散，按“史法”和“史事”重新装订，以便更好地学习赵翼如何考史，如何论史。

但由于形势的变化，生活道路的改变，他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的愿望，多年以后才能实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一个动荡变化的时期。

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等等，对富有爱国心的青年陈垣产生了很大影响。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启发了他的民主意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激发了他的民族精神。他积极投入了当时的民主革命运动。

1905年，他在广州同画家潘达微（后来曾勇敢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收埋尸骨）、高剑父等人筹办《时事画报》。这是一份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刊物，有图有文，陈垣负责报中文字。

这时美国政府颁布《华工禁例》，排斥华工。上海、广州等地纷纷组织拒约会，抵制美货，陈垣是广州拒约会负责人之一。美国防部长及总统女儿为首的美国游历团二百多人定在当年九月初到广州“视察”抵制美货情况，清政府准备盛大招待。当时广州交通工具是轿子，陈垣、潘达微、高剑父等创作并四处张贴《龟抬美人》漫画，意即谁为美国游历团抬轿，谁即是乌龟。结果游历团抵广州，连一乘轿子也雇不到。地方官吏恼羞成怒，逮捕了广州拒约总公所主任马达臣等三人。但广东群众拒约运动仍坚持不衰，《时事画报》即于九月创刊。陈垣在《时事画报》上以“钱罨”、“谦益”等笔名发表了许多宣传反帝反清的革命文字。“钱罨”是广东对贮钱的“扑满”的称呼，“谦益”取其与“满招损”相对，都有反满的含义。

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公开发表反清文字是很危险的，因此陈垣经常改换笔名，并在每次发表尖锐抨击清朝的文章当晚，转移住所。他巧妙利用历史（特别是利用清历朝皇帝的“上谕”）来影射现实。1906年，他为暂避当局的迫害，回到家乡的篁庄小学教书，讲授当时还十分新鲜的国文、算学、体操、唱歌、美术等课程。

1907年他回到广州，除继续为《时事画报》撰文外，又在振德中学任教。这时发生了一件对他影响很深的事。他父亲患肾结石多年，非常痛苦，家中虽开中药行，但中医中药久治无效，转而请西

医手术治疗，结果痊愈了。他于是选择医学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职业。当时广州没有中国人办的西医学校，他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校当局歧视中国籍的教员和学生，广州的一些爱国人士决心自办一所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西医学校——光华医学校。陈垣也愤然从博济医学院退学，成为光华医学校的发起人之一，又是它的第一届毕业生。1910年毕业后又留校讲授解剖学、生理学等课程，并在课余义务行医。后来他虽然没有再从事医学，但一直保持着对医学、生物学的浓厚兴趣，客厅长期摆着一具他心爱的瓷制骷髅模型。

在学医教医的同时，陈垣在《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宣传医药卫生的文章，包括医学史的文章。以后又主编《震旦日报》，鼓吹革命。

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前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三十三岁的陈垣当选为国会议员（众议员），并于民国二年（1913年）到北京，从此在北京定居。

到北京以后的头十年，陈垣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他与交通系的梁士诒关系密切，1921年梁士诒组阁，他自1921年12月至1922年5月曾署理过半年的教育次长，并代理部务。但民国成立以后，国事日非，连年军阀混战，他原来的希望逐渐破灭了。他“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转而专心致力于教学和著述，而北京确实也提供了这方面的条件。

从祖国南疆的广州来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他结识了不少学者名流，得以交流切磋。北京丰富的藏书，使他读到了许多在广州想读而读不到的书。

他当时交往的友人中，对他后来影响最深的是两位爱国的天主教徒马良和英华。马良（相伯）创办震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英华（敏之）是天津《大公报》的创始人，当时两人正为筹办中国的天主教大学而努力。陈垣当时信仰基督教，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基督教史，知道英华藏有大量这方面的书籍，向他借阅，

英慷慨借与，因此马、英、陈成了忘年的莫逆之交。

1915年，原藏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运到京师图书馆。陈垣在以后的十年中，用相当多的时间研读这部八亿多字的大丛书。当时他住在北京西南角的象坊桥，书藏东北角的方家胡同，来回路程将近四小时。十年时间，他彻底研究了这部大丛书，并且大量阅读了《四库全书》中外间没有或罕见的书籍。

陈垣是在1917年（三十七岁）发表第一篇正式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时，开始他的史学研究工作的，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但他一鸣惊人，并迅速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公认的史学大师。这绝不是偶然的，他在前三十七年打下了广博而坚实的基础。

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和多年的革命实践，培育了他炽烈的爱国精神。这是推动他毕生不懈从事史学研究的动力。

宣传革命和普及科学的文字工作，练就了他犀利的笔锋和简明的文风。

近代自然科学的严格训练，给了他一把解剖历史的手术刀。30年代，他在一封家书中曾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

多年的自学生活，锻炼了他勤于思考、不断创新的习惯。再加上天赋和勤奋。这些就是他成功的条件。

二

从1917年至1937年这二十年，是陈垣史学研究事业的第一阶段。宗教史、元史以及史讳学、历史年代学、校勘学、目录学，是他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领域。

1922年他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开始在高等学校任

教。以后又相继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1926年开始）、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1928年）、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1929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名誉教授（1931年）。他在高等学校整整度过了半个世纪，直到逝世。他对教学认真负责，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有许多创新。如“史学名著选读”和“史学名著评论”课就是今天大学历史系普遍开设、并作为基础课的“历史文选”和“中国史学要籍介绍”的前身。他创设的“史源学实习”课，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锻炼了他们动脑动手的能力。他还十分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好几位他在二十年代教过的学生，如郑天挺、翁独健、柴德赓都清楚记得，陈垣对他们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北京。”“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这些话长期激励着他们。在他严格要求、耐心教育下，一批批学生学成，不少人成为史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同时，他也从学生身上汲取营养。他曾说：“青年人富于理想，活泼热情，朝气蓬勃，对新事物敏感，我常常是从同学提出的问题里得到启发。”

1922年他曾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馆长，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以后，他又担任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他尽心尽责，维护祖国的利益。在京师图书馆时，他对馆藏的为帝国主义劫余的八千卷敦煌文书进行了细致的查点、登记、清理，以此为基础，后来编成《敦煌劫余录》十四卷。1926年，当奉系军阀准备以接收为名抢掠故宫的珍贵文物，而清室善后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又临阵脱逃时，他挺身而出，为保护故宫及其文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他曾遭宪兵司令部拘留，虽然在舆论压力下半天就得到释放，但家中长期驻有两名宪兵监视。在内阁大库档案中占重要地位的军机处档案之得以保存和利用，他也出了大力。同时，他也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大量阅读了京师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籍和故宫所藏明清档

案，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构成这一时期他的研究特色之一。

对于前辈学者，他这时最推崇的是钱大昕。从研究方法到内容，都受到钱氏的启发。前引家书中所说“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最主要的就是钱大昕的方法。他师古而不泥古。他受过近代自然科学的训练，因此论证更加缜密。他写《史讳举例》，初版时有些材料转引自钱氏，后来才发现以精确著称的钱大昕仍不免失误。以后他在“史源学实习”课的导言中，谆谆告诫学生引书必须检查原文，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这确是他自己多年实践的宝贵经验。

陈寅恪在为《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写的序言中说：“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陈垣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表现在，第一，他不是把宗教当作信仰，而是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来进行研究。他特别注重宗教与文化、政治的关系。第二，他不是只研究某一种宗教的某一个问題，而是对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主要宗教都进行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以基督教史和佛教史最为丰富。关于伊斯兰教，他曾计划编《中国回教志》，收集了不少材料，并有《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篇演讲词。对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他编纂了一部大型碑刻资料集《道家金石略》。对于摩尼教、火祆教、犹太教在中国流传的情况，他都作了系统的论述。

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点之一，是它的研究对象是一去不复返的，因此它的主要材料是历史文献。历史文献是由人编写的，它是否真实反映当时的实际，以及反映的深度和广度如何，这是历史研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历史文献本身经过多年的流传，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许多讹误。如果不了解这些致误的原因和情况，引用讹误的历史文献，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陈垣在历史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所作的工作，就是要

解决后一方面的问题。中国特有的避讳现象，过去不少人讲过，书籍的校勘，历来受到重视，出现过不少校勘名家，但直到陈垣的《史讳举例》和《校勘学释例》出版，才使它们成为一门学问。原因就在于他不仅仅是提出某些个别的例证，而是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因避讳或刊刻而致误的各种具体原因，指出发现、纠正这些错误的方法，并进而告诉人们如何利用这些方法去解决历史文献中的问题，恢复其本来面目。他在《史讳举例》的序言中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辨焉。……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学科也。”

工具书的编纂和资料工作，过去为研究者所轻视。陈垣在研究实践中痛感中国工具书的缺乏，自己在每研究一个问题之前，都亲自编制有关的索引、目录。这些工具书既供自己使用，也常为其他学者所借用。这类工具书中最著名的就是历史年代学中的两部巨著《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他研究元史、宗教史，间接接触过一些西方及阿拉伯人的著作。书中的记事用西历或回历。西历是阳历，回历是阴历，而辛亥革命以前使用的中历则是阴阳合历。因此西历与中历每年有二十几至五十几天的相差，回历每过三十几年便比中历多一年，曾造成历史记载的错误。但在当时，连一本中西史对照的年历都找不到，更不用说中西回史年历。为了准确推算历史上中历的某年某月某日相当于西历和回历的何年何月何日，使中外关系史、元史的研究建立在更准确的基础上，他用了四年时间编成上述两部工具书，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些学术界朋友劝他不要在这上面花费时间，他在《中西回史日历》序言中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岂敢言历哉！”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回答。事实表明，这两部书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预期的范围，并有长久的生命力。原书编至1940年止，解放后

再版时，应各方面的要求，续编至公元2000年。

这一阶段他的代表作是《元西域人华化考》。还在广州的时候，他对元史就特别感兴趣。在方功惠家见到《元典章》，借阅旬日，爱不释手。他在《时事画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有些就是谈元代历史的，不过这是借抨击元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来影射清朝。清朝灭亡以后，形势变化了，他也注意到了元代历史的另外一面，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交流以及中外交流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部书所论述的，主要是元代色目人的汉化。书中大量利用过去很少被人注意的文集。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理明辨，是它的特点。发表以后，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垣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平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以后，他没有离开。当时他的想法，一是离不开他从事研究所必需的大量书籍，二是他从历史上得到信念，中国是绝不会沦亡的。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战争竟持续了八年之久。

在这八年中，他不顾敌人的威胁利诱，坚持不担任伪职，包括所谓“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当时北平的多数大学迁移至后方，只有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因是教会学校而能保留下来。太平洋事变爆发后燕京也被迫关闭，北平只有辅仁一家学校不向敌伪当局注册，许多不愿进敌伪办的学校的青年学生进入辅仁。坚持教学和著作，是当时陈垣的全部活动。

1943年11月，陈垣在给方豪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他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